



AI

韧性全球化：全球化的新方向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全球化正在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与此同时，全球化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日益严重，经济的不稳定性愈发凸显，贸易保护主义显著抬头，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加剧。这些挑战不仅影响了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也促使各国对全球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调整。在此背景下，为了使全球化保持稳定和持续发展，实现更加包容和公平的全球化，韧性全球化建设成为应对各种挑战和风险的必要策略。为此，2023年12月10日至11日，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举办了“全球化新阶段与文明新形态”学术研讨会，就“全球化新阶段与韧性的全球化”这一主题，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视角进行了深入探讨，《探索与争鸣》约请部分专家撰文，期冀对推动韧性全球化建设起到理论助益。

薛晓源教授通过桥梁、水晶宫等具象的隐喻，指出当下全球化正面临转型，新的风险和复杂性不断涌现，要通过释放全球化的善意、增加价值链的韧性、构建风险与安全的共同体，以应对全球化所遭遇的风险。刘雪莲教授认为，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都不代表着全球化趋势的消失，全球化呈现出韧性特征，不同主体都尝试在“再全球化”的进程中追求不确定形势下的适应性，并积极调整自己的政策。肖恩·布雷斯特林教授指出，全球化带来了安全问题，尤其是生产全球化使各国对关键商品和资源的供应中断变得格外敏感。全球化带来的不安全性需要各国共同努力，通过制定策略、加强风险评估以及促进多元化供应等方式，来确保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庞中英教授从“创造性破坏”视角理解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正经历着由“创造性破坏”推动的深刻变革，这一过程不仅重塑了世界经济格局，而且挑战了全球化的传统模式。“创造性破坏”理论揭示了全球化不断进行内部革新、破坏旧结构、创造新结构的本质。贾克防研究员指出，以拥抱变化为核心的韧性思维、韧性策略，已成为人们构想未来世界的新方式。韧性思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为构建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世界秩序提供指导。刘兴华副教授指出，全球化并未进入停滞期，而是借助数字全球化驶入了快速演进的新轨道。数字技术不仅为全球化提供了广阔的拓展空间，还为其带来了韧性重塑的契机。在数字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积极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推动全球化的韧性重塑，助力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主持人 孙冠豪 高原

风险、韧性与全球化

——全球化的隐喻、困境与曙光

薛晓源，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

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全球化经过 30 多年的高速发展，虽然遇到过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巨大的风险和挑

战，但总体上依然发展迅猛，人们称这一时期的全球化为“超级全球化”。直到近年受到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全球化遭遇巨大挑战，有学者将这期间的全球化称为“有限的全球化”。在这期间，虽然人们的普遍联系和交往通过数字技术得以延续和伸展，但人们仍然感到全球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有学者认为，全球化被“冷冻”了，全球化在“躺平”；而如何释放全球化的韧性，消除全球化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风险和危机，是当下学界和实务界需要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风险、韧性与全球化：问题与隐喻

风险、韧性与全球化既是这个时代人们对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活世界的普遍感受，又是对这些突如其来的社会复杂现象的抽象概括，这些概念和问题凝聚着人们感性的认知、知性的分析和理性的反思。针对这些重大的复杂社会现象，如果我们只是进行理性归纳和概括，这些现象的丰富具体性和鲜活性就容易被掩盖和遮蔽。那么，如何既保持对这些现象直观生动的观察，又能理性地切中这些事物的要害，把握事物的本质，让事物本来的意义本真地向我们呈现？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一些学者针对这些复杂社会现象，善于运用隐喻的方法，巧妙避开了就事论事的狭隘性，让现象的自身意义和他者的意蕴有机粘连起来，通过生动的具象将两者意义进行粘贴和缝合，通过缝合让事物更丰富的意义在当下立现，从而不断对现象进行意义充溢，持续对现象进行意义的累进和叠加，把事物不同维度的侧显进行意义复合，让复杂事物的知识境

域和生活世界直接呈现出来，得到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所倡导的“本质直观”的效果。

（一）全球化的隐喻：桥梁与水晶宫

“全球化”这一概念自问世以来，如何对其进行概念界定，学界一直众说纷纭。大前研一、福山等全球化激进派赞美全球



① 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1期。

② 齐美尔：《桥与门》，涯鸿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2—7页。

化，认为全球化重塑了历史；也有以赫斯特为代表的全球化反对派质疑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没有改变民族国家存在的事实，全球化是一个“神话”；吉登斯、贝克等全球化理论温和变革派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结果，全球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生活世界。

对于这一概念，贝克指出：“全球化是一个沟通相互不同的原点的语言桥梁。其全部的意义不在于它的非线性的过程，而在于它可能指明了一些已然形成的、经验的、历史的、多样的过程。”^①这种观点代表了温和全球化理论的理性判断。桥梁是一种积极的、跨越分离的联系。齐美尔认为：“桥将有限的跟有限的联系起来……克服这些障碍而架起的桥梁标志着我们意志势力的发挥超越了空间。”^②桥梁作为一种超越空间的中介，使不同地区的人们可以沟通，进而理解和交往。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可以看见的“交往理性”。

全球化 30 多年的历史演进，也逐渐验



微信公众号



证了上述对全球化的理性分析和判断。全球化使跨国的供应链、生产链、价值链和消费链开始逐渐联系、贯通和融合，全球的资本、货物、人员、符号开始快速流通，正如吉登斯所言，全球化是“流动的现性”。全球经济像飞架的桥梁一样联结成一个空前紧密、高度整合的整体，也让人类社会的经济克服分离、相互依存达到空前程度，在很多重要指标上都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

① 彼德·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全球化的哲学理论》，常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彼德·斯洛特戴克把全球化形象简化为一座巨大的“水晶宫”。^①它非常巨大，容纳了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有约15亿人口居住其中，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全球化是一座与外界隔离的独立空间，有坚硬的外壳、明显的边界，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被挡在外面，很难进入。“水晶宫”容纳了资本的世界内部空间，是“消费社会”的天堂，在这个温室里，做人首先变成了一个购买力的问题，人们享受金钱和富有，却不知道他们的金钱和富有从何处而来，水晶宫的剥削性和寄生性由此展现出来。全球化在斯洛特戴克表述中，形象地展现为一座金光闪闪的水晶宫，是消费主义的天堂，是舒适温暖的乐土，是阻止外人进入的围城，是市场和资本聚焦的绿洲。

笔者认为，斯洛特戴克的“水晶宫”隐喻与贝克的“桥梁”比喻生动地展示了全球化的空间性问题与空间生产问题。我们对此也做个比喻：万里跨海大桥向外延伸，闪闪发光的水晶宫就是桥头堡，桥头堡是桥梁的中心，并不断组装桥身向外延伸。桥头堡居于枢纽，对外发号施令。桥头堡、桥梁、水晶宫都蕴含一个强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即空间的生产和空间霸权问题。沃勒斯坦认为，20世纪的人类历史具有了真正的全球性，世界经济体分为“中

心—半边缘—边缘”极端不平等的层级，欧美等发达国家居于体系的“中心”，一些中等发达国家居于体系的“半边缘”，某些东欧国家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处于体系“边缘”。“中心”拥有多种优势，对“半边缘”和“边缘”地区进行剥削，“半边缘”地区对“边缘”地区实行剥削，“边缘”地区只能被动接受剥削。斯洛特戴克指称的水晶宫里面居住着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水晶宫之外居住着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水晶宫里面是全球化资本的内部空间，对外发号施令，生产“半边缘”和“边缘”空间，营造“抽象空间”，抹去空间的一切地方性特征与差异，从而控制整个世界。

斯洛特戴克和沃勒斯坦的相同之处就是揭露了世界资本内部的强权，但他们又无奈地承认全球化与世界体系在历史中的进步性。不同的是，斯洛特戴克对全球化世界进行两分：水晶宫内与外；沃勒斯坦对世界经济体进行三分，真实呈现了世界不同地区的经济依附关系。他们的知识主张都自觉不自觉地呈现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精心设计和构建，那就是自己位居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强力维持“中心”的疆域和边界，修建围栏和高墙，阻止其他人涌入中心，从而更方便剥削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水晶宫”的意象暴露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推动布局全球化的真实意图，揭示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全球化建构的自私性，也反映了西式全球化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在这种模式下，全球化的“善意”和“美德”没有真正呈现出来，所以有识之士如美国的小约翰·柯布，就呼唤要推进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

笔者认为，斯洛特戴克的“水晶宫”隐喻与贝克的“桥梁”比喻展示了全球化“中心与边缘”这一强烈的矛盾关系，揭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带来的难以化解的矛盾：世界统一和世界分裂。这是全球化百年运动与发展的结果，是现代性的后果，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揭示了全球化空间意义的标注和指认不再以地理学意义的位置空间为中心，而是以政治经济体系的建构为中心，它以剥削与反剥削、控制与反控制、统一与分裂作为其运行世界的逻辑机制。中心国家与地区强大的政治经济辐射力和边缘国家与地区无奈接受都构成强烈的

反差，这些张力构成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霸权与反霸权的主旋律。笔者认为，“中心与边缘”也会在极端情况下演变成“文明的冲突”，但同时，全球化的韧性在这些冲突和激烈对抗中会获取新的力量和进步的源头活水。

（二）风险的隐喻：回旋镖、烫手山芋与定时炸弹

当下，不确定性越来越突出，世界上各种“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极端气候不断侵袭，使人们感受到全球风险社会的日益临近。为此，我们要追问什么是风险？贝克认为，风险是现代化的副产品，是不受欢迎的富余。人们在进行现代化大生产中，只关注产品的盈余和生活的富足，而无意关注对大自然的侵蚀和伤害，现代化大规模生产对自然和气候的损害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人们对自然的破坏使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叠加，使人们处于一个难以脱逃的危险境地。为此，人们开始反思风险的源头以及风险是如何构成的。贝克认为：“现代化风险迟早会冲击风险的制造者或受益者。现代化风险具有‘回旋镖效应’，打破了阶级图式。生态灾难或核泄漏向来无视国界。就算是富商大贾或有权有势者，也难逃其影响。”^①“回旋镖效应”隐喻一种政策、策略或事件，其影响在实施之后会返回到发起人身上，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或反噬。风险的制造者预料不到自身会被风险反噬，因为现代风险没有国界，既不分人种，也不分贫富，风险面前人人平等，自然风险和气候变化会跨越民族国家的疆域和边界，风险的制造者并不能凭借社会地位和财富躲避风险。

此外，风险的制造者往往把制造的危险转化为可有可无的风险，成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笔者认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还有一层意思是指作为“科层制”的现代管理体系面对风险的不作为。面对问题局部层层负责，但面对整体风险的不负责任和逃避责任，局部和线性思维影响和限制了风险的整体管控和总体治理。最顶层设计应该有一个稳定的组织，需要有社会伦理道德责任的人来承担委员会的责任和义务。那么，谁来为全球化运行和发展承担伦理学责任？贝克多次呼吁，欧盟及联合国应当担当责任，提高全球治理的水平和能力，甄别重大环境事件的恶性影响，建立全

球环境危害惩罚机制。

针对“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贝克说：“人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做某些事，自己却不必为此负责……这就是我们在面临极具威胁的生态灾难时还在急忙传递‘烫手山芋’的样子。”^②人们在风险面前往往选择逃离、回避，尤其是风险的制造者会利用各种手段去转移或者转嫁风险，他们逃避风险，逃避责任，风险成为“烫手山芋”，人人都在躲避，这就是许多生态灾难找不到风险责任主体的原因。

贝克认为，风险作为文明的“定时炸弹”已经开始滴答作响。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指明了一个未来，而我们必须对此加以预防”。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深入思考风险与时间的关系。风险、危险和危机之间有内在关联：风险的着眼点和身位是未来，它关注的是即将来临的危险和危机；危险的着眼点和身位是现在，它关注当下所遭遇的事物和情景关系；而危机着眼点和身位是过去，已经处于其中不能自拔的场景和情景。所以风险、危险、危机三者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和生成，关注它们之间生动的转化、转变，要把握其中的度。虽然我们已处在全球生态“绝望”的时代，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地球濒临崩溃的倒计时中，但是我们还是要用理性去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情形，去寻找其中的一线生机。

我们认为，风险的隐喻——回旋镖、烫手山芋与定时炸弹，都与全球化的时间性息息相关。风险、危险和危机在全球化时代变幻莫测。全球化进入了加速度的时代，全球化与加速度的“双剑合璧”使风险、危险和危机更加难以预测和防范。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快速升腾，使我们这个世界成为全球风险世界。进入21世纪以后，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高

① ②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9页，第23页。



铁和飞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出行的必备，我们进入了德国社会学家罗萨所言的“加速”时代，全球化加速度使风险、危险和危机播撒更快更广，更难把捉、更难以化解。回旋镖、烫手山芋与定时炸弹的隐喻也许能使我们有所警醒，提示我们学会运用非凡的责任心和韧性智慧去有效地化解风险。

（三）韧性的隐喻：橡树和芦苇

当下，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有识之士提倡发挥和延展人类的韧性。韧性是指人类克服困难、战胜困难，自我康健的修复能力。因此，我们要追问什么是韧性？布伦纳梅尔曾用拉封丹的著名寓言《橡树与芦苇》来形象概括韧性的内在和外在的张力。他说：“橡树极具稳健性，高大挺拔，在寻常的大风里显得坚不可摧。与之相比，芦苇则是柔韧的，微风也会使之弯腰。可是当强风暴袭来时，芦苇却高声宣告：‘我将弯而不折。’”^①大风之后，橡树倒地，芦苇却挺拔傲立。从这些表述之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韧性表层含义具有抗压性、伸缩性、复原性，它的深层底蕴则具备灵活性、康复性、学习性。

韧性可以区分为自然韧性与社会韧性、物的韧性与人的韧性，人从自然韧性看到社会韧性，从物的韧性移情延伸到人的韧性。人的韧性包含了人的学识、勇气、胆量和智慧。人们看到金属与植物在重压之下所展现的伸缩性、延展性和抗压性，受到启发，创造性地发挥了人的同情—移情的心理机能，通过对物和自然韧性的认知、模仿、提炼，并升华到人的勇气和智慧。人运用所学到的智慧，增加了抵抗风险的见识，培养自己的诊疗和康复能力。因此，我们提倡在韧性社会里，既要学习芦苇的柔韧性，也应看到风险与危机之下的社会

韧性与全球韧性建设中人的智慧，我们提倡韧性智慧、韧性管理，即走出阴霾，提高弹性，增强复苏，恢复繁荣。

布伦纳梅尔认为，风险与韧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韧性在人的风险之中穿行，人的韧性培养与提升，与认知风险和化解风险有关。因此，对待具体事物，我们有必要区分事前韧性、事中韧性和事后韧性。事前韧性要求对风险进行多维度认知，事中韧性要求对所面临风险的分析和判断，事后韧性要求增强对风险理性管理和反思的能力，增强对风险的记忆和智慧反应。

那么，如何提升韧性？布伦纳梅尔提出了几条建设性的路径：提高适应性、灵活度与变革能力；风险暴露与避免失衡累积；韧性缓冲更为灵活，以应对各种“已知的未知”或“未知的未知”的风险；通过替代性来提升韧性，如跨行业学习等。

笔者认为，从自然韧性到社会韧性，从韧性管理到全球韧性，关键是要关注全球化的动态平衡性。这种平衡性需要关注事物的外在屈身性和内在张力。在“韧性时代”和“韧性社会”里，有识之士有一种强烈愿望：就是运用韧性智慧和思维去拯救处于“雾霾”和“阴影”之下的全球化，增强认知和化解全球风险的能力，克服困难，提高供应链、产业链的弹性和复苏能力，提高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水平，维护多边性质的国际秩序。提高全球化治理的韧性，我们要高度关注全球治理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关注全球各国政治、社会经济的脆弱性，关注各国和国际之间的敏感事物和敏感事件，提升全球治理水平，把握全球性脆弱性与敏感事物的内在关联。

当前，全球治理在全球韧性方面出现前所未有的治理赤字，很多国际组织因为各种原因不作为或者乱作为，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因人事安排问题近年来长期停摆，给经济全球化的延伸与拓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巴以冲突、俄乌冲突在联合国层面长期难以达成和谐一致的意见和行动。和平赤字如同一堵横亘在国际组织面前的大墙，如何运用韧性治理与韧性智慧去化解危机，成为前所未有的难题。

^① 马库斯·布伦纳梅尔：《韧性社会》，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第2页。

全球化新阶段：困境与曙光

目前的全球化可以说步入了一个新阶段，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遭遇局部断链和运转不灵的问题，部分西方国家，看到本国产业日益空心化，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蓝领工人失业人数增加，全球化释放的红利日渐稀薄，便开始围剿和打压全球化，不惜代价阻拦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斯洛特戴克笔下的水晶宫围墙被修筑得日益坚固、坚不可摧，有形的围墙与无形的围墙被高高架起。面对各种风险，西方主要国家把风险与灾难视作烫手的山芋，不愿意为全球治理承担责任。俄乌冲突以及日本核污水排海，使生态全球化遇到前所未有的灾难，全球气候与生态共识出现巨大裂缝，使本来就面临困境的全球化更加困难，全球化真正处在风险与危险的十字路口，危机迫在眉睫。但是，正如诗人荷尔德林所说，哪里有危机，那里就有拯救。全球化在阴霾之中也透出迷人的新曙光。

新曙光之一：释放全球化的善意，发挥全球化的美德。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笔者理解就是最大程度上释放全球化的善意，发挥全球化的美德。所谓释放全球化的善意就是发挥全球化本身的互联、互通、互惠、互动的作用，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全球治理的一体化进程。所谓发挥全球化的美德，就是最大限度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市场经济的自由流动，增强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普遍联系和普遍交往。

新曙光之二：增加价值链的韧性。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20年9月发布的《全球价值链的风险、韧性和再平衡》报告指出：“我们将韧性在广义上定义为抵御、承受和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而最新的技术发展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能够运行场景、监测多层供应商网络、加快响应时间、甚至改变生产的经济学原理。”全球化风险带给价值链的冲击越来越严重，鉴于价值链互联、互通、互惠的本质，应提高供应链韧性和弹性。包括增强渠道的多元性和应变的灵活性，加强市场风险管理能力和提高市场的透明度等。

新曙光之三：构建风险与安全的共同体。贝克认为：“风险社会制造了新的利益对立和新的危险共同

体……风险社会已经催生出客观的‘危险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最终只能在世界社会的框架中加以理解。”^①危险与安全是一对孪生兄弟，“危险共同体”促使人们思考，风险已经成为全球风险，在极端天气和生态灾难面前，没有国家和地区能够置身事外。全球安全倡议给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新的曙光，呼吁构建人类安全的共同体，已成为全球化新阶段人们的普遍愿望。

从现象学角度而言，全球化有许多侧显，展示全球化复杂多变的维度，全球化的桥梁与水晶宫隐喻展示了全球化的空间变幻，以及全球化的空间生产与空间霸权，继而展现出全球化既是同质化与异质化相互博弈缠斗的过程，也是全球社会“麦当劳化”与“马赛克化”同化与分裂的过程，全球社会的完整性与破碎性裹挟其中、震荡不已。

全球风险的隐喻——回旋镖、烫手山芋与定时炸弹，展示了全球化时间的即时性、同步性、共振性，时刻标划着全球化的时间性质：它是突然加速的社会。我们面对突然袭来的风险、危险和危机要有强烈的时间意识和时机把控能力，需要韧性治理和韧性智慧。韧性的隐喻是橡树和芦苇则展示了全球化的延展需要全球治理有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智慧和能力。本文通过展示全球化的多种隐喻，力求从整体上把握全球化的空间性问题、时间性问题和复杂性问题，从而化解各种治理赤字，积极构建普惠包容的全球化与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

^①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45页。



冷战后，全球化经历了被称为“超

级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时期。这种全球化进程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停滞，受危机的影响，一些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遭到冲击，使全球化的动力减弱。当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提出本国利益优

全球化的韧性特征与韧性建设

刘雪莲，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

系。^①其中一些结构性矛盾始终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存在，在“超级全球化”时期，这些矛盾就不断地集聚，使全球化变得复杂而危机四伏。

全球化的矛盾性最初是以“反全球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如1999年被称为“西雅图风暴”的反全球化示威是标志性事件。此后，在环境部长会议、西方八国首脑会议、世界经济论坛期间，都有反全球化运动出现，并逐渐从最初单纯的抗议活动发展到理性的对话与思考，同时提高了组织性。在现实中，反全球化一直是与全球化相伴而生，是“另一种全球化”。^②从主体来看，反全球化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层，由于工厂的迁移和人口的流动，发达国家的工人面临着失业压力和福利削减的困境，这激化了其国内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此外，一些非政府组织是反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它们在各自领域内提出反全球化的主张。

此时，以国家为主体来反对全球化的现象较少，比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批评“全球化为穷国带来了灾难”，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指责“全球化是一个骗局”。^③但他们也并非反对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均衡、不公正的方面。在结构上，由于冷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开始融入世界并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进力量，增强了全球化的内在动力；而反全球化的力量与全球化的推进力量相比较为弱小。它们虽然拥有自己的国际论坛和组织，但大多零星分散、各自为战，缺少国家权力和财富的支持，因而反全球化的效果也是微小的。此时，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占据主导地位，自由主义的规则和秩序成为全球化的主要规范。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国际地位与综合实力相对衰弱，并逐渐产生了对资本收益分配不均与经济利益失衡的不满。曾经对全球化抱有极度热情的西方国家对全球化的失望情绪不断增长，

① 李彤：《揭秘“去全球化”和“再全球化”：理解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力量》，《战略决策研究》2023年第4期。

② 庞中英：《另一种全球化——对“反全球化”现象的调查与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2期。

③ 王志民：《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6期。



先，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之后，“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等浪潮兴起。然而，在现实中，全球化所建立起来的整体性联系很难割断，“再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再全球化”的进程中，时代呼唤“充满智慧的全球化”，也更期待能抵御风险冲击的“韧性全球化”。

全球化面临转型：主体与结构的视角

在全球化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主体与结构的作用比较突出，形成了作为施动者的主体与结构之间的一种互构关系。作为施动者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它们有自己的意志和目的，是具有主动性的行为体。结构主要指塑造国际体系的总体框架和条件，包括权力的分配、全球经济的性质、国际制度、规范和意识形态。结构设定了行为体运作的边界，并影响其行为。结构性因素主要包括国家间力量的均衡、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全球市场等现行经济体

保护主义、本土主义观念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①特朗普上台之后，将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归咎于全球化，在国家政策层面大搞“去全球化”的招数，同时在美墨边境地区修墙阻止移民进入。欧洲一些国家在全球化的整体发展中也出现逆流。在这种形势下，美欧参与国际合作的意愿不断降低。去全球化侧重于在国与国之间树立贸易壁垒，以邻为壑；而逆全球化是在去全球化运动的影响下导致各国经济政策的改变，最终形成逆转全球化的现象。^②从主体来看，无论是去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都是依靠国家的力量来运作的，国家的主体地位被凸显出来，表现出国家主义的回归。在结构上，逆全球化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化发展所导致的力量对比关系变化的忧虑，他们担心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会削弱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的领导地位。因而，在总体结构上逆全球化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而大国竞争也从经济领域外溢到政治、科技乃至意识形态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撕裂着全球化的整体性。

然而，去全球化也好，逆全球化也好，都不表明全球化的消失，而是全球化的转型。逆全球化并不是全球化的全面回潮与衰退，而是某些国家在一些领域、一些方面对于全球化的成果进行否定或拆解；在另一些方面，这些国家则积极寻找出口渠道，比如以区域合作、跨区域合作来推进跨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在大国冲突、地缘政治回归的形势下，西方发达国家也在不断调适着自身的政策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做“有选择性”的再全球化；而新兴国家并没有颠覆全球化发展所遵循的原有规则体系，相反极力维系原有体系，它们想要改变的只是原有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追求更有效、更公平、更持久的全球化。因而，我们看到的一种现实是：全球化呈现出韧性特征，表现在不同主体都在追求不确定形势下的适应性，在积极调适自己的政策；同时，各主体在“再全球化”过程中，探索不同方式和路径以维系跨国的经济联系。

全球化的韧性特征

近年来，“韧性”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逐渐得到

广泛的应用。从一般意义上来看，韧性包含了这样几方面的观念：一是韧性主要应对的是内外部风险与挑战；二是韧性体现的是主体受外界干扰时所具有的适应性能力和回应性能力；三是韧性也体现主体受外界冲击后的恢复性能力和创新性能力；四是韧性往往反映在不同结构环境中。当前，面对社会的不确定性风险与挑战的加剧，关于“韧性”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一）全球化中主体韧性的增强

在全球化发展中，主体的推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全球化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过程，它始终包含着国家、公司以及其他一些集团力量的积极推动。^③“全球化就像以往涉及市场和贸易的其他发展一样，是一项政治工程……是一种由政治意愿而绝不是命运所决定的发展。”^④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期，国家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将权力向上转移给国际组织，向下转移给次国家行为体，同时将一些权力外包给企业或民间机构。国家权力的流散成就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为，也使全球化主体变得多元化和多维化。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国家主体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经历了“超级全球化”的发展，各种壁垒已经被打破，国家已经是被全球化“洗刷”过的国家了，生存和发展方式已经被改变，敏感性和脆弱性在增强，国家存在于国际社会复杂的网络系统中。

应该说，在“超级全球化”时期，国家积极融入全球化，分散其权力，这本身就是国家韧性的一种表现，是国家主动适应全球化发展、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必然路径；而国家主义的回归仍然是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后国家回应力的一种反映，是国家能动性的凸显。在“逆全球化”形势下，国家要从原有全球化的全

① 王正毅主编：《反思全球化：理论、历史与趋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125页。

② 任剑涛：《逆全球化、民主轴心与全球化重构》，《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3期。

③ 刘雪莲：《政治与全球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9页。

④ 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全球化的十大谎言》，胡善君、许建东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45—46页。



球经济连接、制度合作、文化交流的状态中走出来，来面对全球供应链中断、大国竞争、制度失效以及国内政治极化和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贸易战、科技战实质上是发达国家对全球化不平衡发展结果的反击，而制造业回归、阻止移民的大量涌入也是发达国家应对经济“空心化”和工人就业与福利受冲击的政策调整。

在逆全球化潮流下，中国显示出灵活的应对能力。中国继续扩大开放，在开放的环境下继续推进世界各国贸易和投资的连接；中国坚定不移地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世界共同利益；中国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并积极参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推动加强贸易和投资、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议题的探讨。这些举措都反映了中国在逆全球化的状况下的灵活应对和创新的韧性能力。

（二）结构的适应性调整

经历了“超级全球化”阶段的发展，国家已经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深陷于相互依赖所编织的社会网络之中。在全球化的“冲刷”下，国家已经成为世界整体中的个体，而且很难从整体中分离出来独立生存。新自由主义理论曾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三个特征，即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包括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的等级之分问题；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首要问题，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军事力量起着次要作用。^①从现实来看，地缘政治的回归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相互依赖的根基，国家间的普遍联系仍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延续着，环境、能源、资源、

人口等全球性问题时刻威胁着人类的安全，这不是军事手段可以解决的。

由于相互依赖的存在，当今的世界依然是全球化的世界。但是，在全球层面，国际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大国之间的竞争，改变了各国相互连接的状况，以及在全球化结构中排列组合的方式。为适应新的变化和有效抵御未来可能的风险，全球化在结构上出现了“区域转向”，即以区域化来协调全球化，从而抵消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从本质上来讲，全球化是超地域性的，它模糊了国家间的地域边界；而“逆全球化”试图割断全球化发展所构建起来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以及全球范围的普遍联系。在这种情形下，区域化的连接是最可靠和最便利的替代方式：一方面，区域化曾经是与全球化发展并行不悖的趋势，有实际的经验可供借鉴。另一方面，区域化是地缘相邻国家之间的一种结构性连接，距离成本的降低和边际效应的呈现使区域化往往比全球化更有利于维持国家间的联系。全球化的“区域转向”不仅是国家主体的韧性选择，也是全球化结构的适应性调整。

（三）技术助力全球化的韧性转型

从全球化发展历程来看，全球化每一次的“排忧解难”都离不开科技的力量。当全球化早期资本受困于狭隘的领土范围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船坚炮利”将资本推向了全球。当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向一体化推进的时候，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数字化光纤网络通信和卫星远程通信技术革命，为全球交往提供了技术支撑，减少了长距离的交易成本，使得空前规模的资本流动成为可能，极大地助推了一体化的进程。当“逆全球化”潮流涌动使全球化面临碎片化风险之时，以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直接促成了全球化的韧性转型。^②可以说，技术进步为全球化添加了韧性的翅膀，赋予了它在困境中重新崛起的力量。

在数字化技术的基础上，全球化呈现出新的韧性特征。数字技术创新了全球互联互通的方式，开启了万物互联的新时代。数字化让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参与到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形成了更加多元化的主体结构；数字技术重塑着全球价值链，促使企业的技术

①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24页。

② 刘雪莲：《数字全球化的价值与局限》，《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研发功能不断提升；数字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2021年全球47个主要经济体数字经济规模为38.1万亿美元，较去年增长5.1万亿美元，数字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①当然，数字技术的进步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领域的大国竞争、新的全球不平等现象以及新的治理规则，给“再全球化”带来新的矛盾。

再全球化进程中的韧性建设

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并没有消除地缘政治，相反，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衡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地缘政治的复归。反过来说，地缘政治的回归也不可能使全球化消失，全球化在主体、结构、技术等层面上有其内在的韧性，推动着全球化跨越现实的危机而走向“再全球化”。未来，我们需要在观念、主体、结构等方面有意识地进行韧性建设，以便更好地推进全球化的持续发展。

首先，人们需要在观念上树立韧性思维。自全球化启程以来，各类风险始终和全球社会与国际关系的运转相伴而行，全球相互联系加深与全球化嵌套发展又成为这些风险的放大镜，强化了国际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性。“远距离的关联性或耦合、非线性变化过程以及突发性的特征，将不确定性提高到我们毫无历史经验的地步。”^②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韧性”的概念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与方法，用以适应复杂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种种问题。

其次，韧性建设需要调和再全球化中的结构性矛盾。从主体结构来看，目前的全球化是多元性与大国性并存的，既有多元行为主体的协同参与，又有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竞争。未来的“再全球化”不仅需要在主体关系上进行协调，而且更需要包容与接纳，因为“再全球化”要建设的是一个以发展为主导的、包容的、平等的、相互依赖的世界，而不是以权力为主导的对抗的、冲突的、“极”的世界。在全球化的“区域转向”中，区域化结构可以体现出对“逆全球化”危机的适应性，但未来的“再全球化”还需要将区域层面重新提升到全球层面，以实现真正的全球化。因而区域化的韧性建设需要有全球化的目标指

向，同时还需要有区域间的协同共进。在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新的结构问题中，如何弥补数字科技所造成的“全球数字鸿沟”问题，也将是“再全球化”要回答的一个重要课题。

最后，要构建韧性时代的新的价值取向。美国未来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其《韧性时代：重新思考人类的发展和进化》一书中提出了“韧性时代”的概念，他认为，以往追求“效率”的进步时代已经让位于个体适应性的韧性时代。在进步时代，空间是被动的自然资源的代名词，治理则是把大自然作为财产进行管理的代名词；而在韧性时代，人们需要以谦逊、正念和批判性思维重返大自然的怀抱，让人类和生物大家庭再现繁荣。从进步时代到韧性时代，就是从让自然适应人类到让人类适应自然的巨大转变。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带来了人类的巨大进步，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挑战，面对诸多全球性问题的不断出现和加剧，需要人们在“再全球化”的进程中寻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在《韧性时代》的中文版序中，杰里米·里夫金写道，一场伟大的世界性变革即将来临，中国很可能是先行者之一。西方文明所打造的进步时代延续了近200年的辉煌已逐渐走向没落。无论人类在短期内取得怎样的进步，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全球变暖和许多物种灭绝为代价的。现在，中国正在改变历史的走向，他洞察到了韧性时代和生态文明的来临。^③总之，在全球化的韧性建设中，最终人们必将以“类生存”的全球意识和生态系统思维来规范自身的行为，以使人类在全球化所打造的整体性世界中长久地延续下去。

①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http://www.caict.ac.cn/english/research/whitepapers/202303/P020230316619916462600.pdf?eqid=a12c38b10015ecc100000026488df4e>，第8页。

② 刘雪莲、肖晨卉：《从国家到国际：国际关系中“国家韧性”的研究视域》，《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1期。

③ 奥兰·扬：《复合系统：人类世的全球治理》，杨剑、孙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6页。

④ 杰里米·里夫金：《韧性时代：重新思考人类的发展和进化》，郑挺颖、阮南捷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前言及中文版序。

① Michael O' Sullivan, *The Levelling: What's Next After Globalizatio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9.

② Eswar Prasad, "The World Will Regret Its Retreat From Globalization,"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3/24/trade-economy-globalization-united-states-china-ira-chips-reshoring-decoupling-industry-china/>, March 24, 2023.

③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Goeconomic Fragmentation and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ism," <https://www.elibrary.imf.org/view/journals/006/2023/001/006.2023.issue-001-en.xml?Tabs=contentsummary-102775>.

④ Ian Bremner, "Globalization Isn't Dead: The World Is More Fragmented, but Interdependence Still Rule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world/globalization-isnt-dead>, October 25, 2022.

如果浏览有关全球化的新近研究，很快就会发现诸多“全球化已死”的断言。在迈克尔·奥沙利文 (Michael O' Sullivan) 看来，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新的转折点，其在影响范围和重要性上与冷战结束的后果相似。^①奥沙利文的关注重点在



于如何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均衡性，比如不平等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大规模不平等，以及当前全球机构在纠正这些不平等方面的无能。此外，埃萨瓦尔·普拉萨德 (Eswar Prasad) 补充道：“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各种地缘政治动荡”，正在促使许多国家寻求“退出全球化，内顾倾向也越发明显”。^②还有观点甚至认为，全球化即将被“地缘经济碎片化” (goeconomic fragmentation) 所取代。^③

哪里有激烈的观点，哪里就有激烈的反对意见。在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和命运前途问题上也是这样。尽管如此，大多数认为全球化还远未结束的人都承认，未来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伊恩·布雷纳 (Ian Bremner) 指出，正如“超级全球化” (hyperglobalization) 在全球危机之后让位于一种新形式的全球化一样，我们正在走向另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时期，由于地缘政治竞争，一些国家之间的金融和贸易流动确实可能会减少，但这并不意

全球化已死？

——反思全球化的关键问题

肖恩·布雷斯特林，英国华威大学教授

味着全球化的经济相互依存会终结。^④

在欧洲，第二种宣称进入新时期的想法似乎反映了主流观点。冒着过于简单化的风险，我们可以找出三个主要理由，来佐证此前的全球化经济网络模式已经出现转向。首先，权力已经从民族国家扩散到其他地方，国家权威需要恢复。这种感觉在现实中经常表现为呼吁加强国家边界，以反对移民或抵制权力从民族国家转移到欧盟，确保国家对自身经济命运的更大控制。其次，是对经济安全的担忧。当一个国家越是依赖从全球贸易中获得自己想要的资源，并出售自己生产的产品，那么它就越有可能遭受这种流动中断带来的影响。最后，是国家安全方面的争论。人们担心可能存在的操纵全球化的经济关系，以此获得政治权力，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对经济治国方略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地缘经济学重新燃起兴趣，即是这种忧虑的表现。然而，考虑到全球网络关系的连接广度和嵌入深度，打破它们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并且打破之后可能破坏稳定。同时，由于非国家经济行为体在塑造全球经济流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意味着政府无法单独完成任何尝试改变这些流动的行为。

全球化、国家与市场

正如保罗·詹姆斯 (Paul James) 和曼弗雷德·斯蒂格 (Manfred Steger) 在研究全球化的演变过程时指出的那样，确定一个新概念何时诞生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或许认为自己已经确定了最早的用法，但后来却往往又能找到更早的用法。然后是主体间义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的学科背景下，同一个词、术语或短语往往有着不同的内涵。话虽如

此，但平心而论，现代关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才真正兴起。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流行，则成为推动当时有关全球化的学术研究和大众兴趣的驱动力。

苏珊·斯特兰奇 (Susan Strange) 是研究全球化这一维度的主要学者之一。在12年的时间里，她出版了四本有影响力的著作，并且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非国家经济行为体 (相对于国家的权力) 引导和控制货物、资源和资金跨国流动的权力。^①在她去世 (1998年)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她对国家和市场行为体之间权力平衡的见解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全球政治和国际经济，而且对今天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仍然非常有意义。

斯特兰奇认为，跨国公司权力的增长并非偶然。它的发生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政府——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希望它发生，并相应地放松了对经济的管制。然而，一旦他们这样做了，所有的政府都会发现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的经济命运，即使是那些一开始就推进全球化传播的国家。^②一些改变就业、利率、汇率等的关键性决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司董事会的影响。因为主要公司决定了在哪里生产什么产品，而对冲基金经理希望寻求更大的投资回报。此外，当许多政府试图增加本国经济对国际流动资本的吸引力时，他们改变财政制度的方式又往往会对政府在社会安全网络上的支出产生影响。虽然不太可能准确计算出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全球化 (或仅仅是全球化本身) 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不平等，但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而进行的生产全球化，显然会使一些人比其他人受益更多。

因此，今天与全球化相关的一些不安全感实则源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偏好和政策的传播。不过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另外两个关键问题对于塑造当代全球化辩论同样至关重要。

全球化与经济问题

首先是全球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的直接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对欧洲而言，除了对个人造成非常现实

的后果，它也影响到了欧盟内部的凝聚力。并且，这不仅仅是一场发生在过去的危机。许多政府为防止更严重的直接后果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同样产生了高昂代价。直至今日，许多国家仍能感受到为应对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衰退所付出的代价。这段2019年对欧洲遭遇持续挑战的评估在今天看来仍然适用：“一些成员国出现长期的宏观经济失衡和高额的公共赤字，以及主权国家和银行业间持续存在的恶性循环风险。危机后的脆弱性还包括加剧的不平等、青年失业和高在在职贫困风险。”

尽管当时人们对银行纾困政策存在许多抱怨和抗议，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受紧缩措施影响的人们随之而来的沮丧情绪却并不总是针对“全球化”本身。在这种情况下，非国家行为体首先出现了危机。正如托马斯·弗莱厄蒂 (Thomas M. Flaherty) 和罗纳德·罗戈夫斯基 (Ronald Rogowski) 所指出的，政党经常将生产全球化的后果与其他问题捆绑在一起，从而利用由此产生的不满。^③其中，移民是一个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它不仅可以对公众的工资、获得健康教育和福利产生影响，而且也会导致一种相当模糊的情绪，即民族性 (无论它可能是什么) 正在被破坏。不满情绪中常常也有反精英的成分，有观点即认为，国内本土社区和声音正在被忽视。有时还有一种更极端的观点，认为“全球化精英”根本不关心所在的这个国家。^④

从本质上讲，上文提到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所引起的关切是建立在随后的全球化危机后果之上并因其而加剧的。这种关切当前正不断产生威胁，也即导致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所说的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决裂”，其最终不仅会破坏新自由主义经济计划，而且可能损害自由民主体制本身。

① 也许说三部半更准确，因为最后一部在很多方面都是对第一部的更新。

② Susan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4-45.

③ Thomas M. Flaherty and Ronald Rogowski, "Rising Inequality As a Threat to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5, no. 2, 2021, pp. 495-523.

④ Manfred Steger and Paul James, *Globalization Matters: Engaging the Global in Unsettled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87-208.



资料图

主题为“重建信任”的世界经济论坛 2024 年年会。资料来源：新华社

①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1, 2019, pp. 42–79.

在 2016 年脱欧公投中，那些希望英国脱离欧盟的人喊出的“收回控制权”口号，目标就是夺回据说已经被欧盟夺走的国家命运控制权。这一口号抓住了许多人对更安全的经济未来的共同愿望，而这通常与一种想法联系在一起：要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以前的“黄金时代”。因此，在英国出现了“收回”控制权的思潮，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出现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想法。这些情绪除了有助于世界各地一些民粹主义政党的选举成功外，还导致许多国家更广泛地呼吁加强国家干预，以保护国民经济免受外部经济利益和力量的影响。

全球化和不安全

第二个主要问题是，生产全球化使各国容易受到关键商品和资源供应中断的影响，这种破坏并不总是有意为之。自然灾害，甚至是在通过一些国际交通要道关键节点时糟糕的航海技术（如苏伊士运河堵塞的情况）都可能导致延误或取消。意想不到的

危机可能导致人们对全球供应链中短缺商品的迫切需求，并因传染疾病等事件而出现供应中断。政治动荡和战争可能会导致生产停止和贸易中断，从而给全球消费者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然而，正是蓄意破坏行动的可能性吸引了一些政治家的政治想象力。长期以来，通过国家干预来支持和促进国家内部行为体并使其在全球经济中获得优势，一直是全球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关键议题。世界贸易组织多年来的工作以及各国采取的双边行动均反映了其重要性。这方面的案例，包括特朗普对来自中国的某些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以及欧盟实现与中国“互惠”的战略目标，即欧洲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与中国公司传统上进入欧洲市场的机会相同。

人们的认识已然改变，即国家不仅试图为其公司获得商业优势，而且还寻求利用经济杠杆来实现政治战略目标。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和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提出的“武器化相互依赖”（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概念就体现了这种担忧。^①这一概念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权力并非均匀地分布在网络的所有部分，一些国家的某些参与者占据着关键地位。这种权力不对称不仅使东道国有能力对本国公司施加影响，以帮助它们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取在政治方面的可用数据，而且还可以扰乱商品和资源的正常流动，以惩罚或约束潜在敌人并奖励盟友。法雷尔和纽曼指出，几十年来，各国出于政治原因一直在利用不对称优势。他们还指出，只有美国、欧盟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在足够多的不同网络中拥有足够多的关键枢纽，可以为他们提供武器化行动的基础。

全球化的未来

那么，这一切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一方面，正如全球金融危机所显示的那样，全球化的失败给许多国家的国内政治蒙上了阴影。此外，应对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成本进一步提高了这场危机的财政和其他经济成本。这导致的部分后果是，旨在“夺回控制

权”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获得更多支持。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担心全球化网络可能被政治化和武器化。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一度被视为不仅是通往繁荣的道路，也是通往和平与安全的道路，但现在却日益被视为不安全的主要来源，因为它可能被寻求实现地缘战略目标的国家所捕获和控制。

全球化已成为安全问题，俄乌冲突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当前和未来的能源安全上，以及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关系能以何种速度发生变化。虽然俄罗斯是一个重要的能源供应国，但对欧洲经济体而言，在广泛的各个领域中，它的重要性远不及中国。在经常重复的表述中，俄罗斯被视为风暴，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事实上，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使各国似乎更关注与中国经济相互依存的长期影响，而不是与俄罗斯本身的关系。

没有中国的全球化真的可行吗？虽然有一些人呼吁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无法想象，在不给相关各方造成重大经济影响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如何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与中国“脱钩”的说法如今已基本没有市场。欧盟所谓的目标是消除那些可能导致被利用的脆弱的经济联系，同时保持那些没有问题的关系。欧盟确定了四个需要优先保护的关键技术领域，这也指明了当下迫切需要关注的领域，即先进半导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

识别风险与解决风险是两回事。如果我们回到在本文开头概述的斯特兰奇的观点，企业做出的许多决定塑造了全球化的网络。那么，如果要发生脱钩，企业也将要做出许多新的决定。显然，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例如，国家可以立法禁止某些部门的投资，或禁止特定商品和日用品的贸易，或设置其他贸易壁垒，使其在经济上没有吸引力（这种情况也发生过）。政府也可以通过立法保护国内生产商免受来自成本更低的外部竞争对手的竞争，投资于国内产能，并提供其他形式的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将生产能力从不值得信赖的地方“回流”（回到国内）或前往“友岸”（流向值得信赖的盟友）。问题在于，如果在经济上没有意义，有多少公司会把国家安全逻辑置于企业商业逻辑之上呢？

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都有成本。要么是政府的成本（最终是纳税人的成本），要么是消费者的成本（以更高价格的形式），更常见的是双方都要付出代价。考虑到长期应对全球危机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许多国家的财政状况，其中一些国家在是否有足够资金来做出重大转变方面必然有严重问题。

事实上，整个欧洲存在着相当大的多样性，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立场、观点或看法。在单个欧洲国家内部，也经常存在相当两极分化的争论。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对全球化和现状的批评来自不同的方向，原因也大为不同。此外，全球化带来的潜在安全挑战无疑比以往更加引人关注。就在不久之前，许多欧洲国家还在竞相成为中国最好的朋友，而不是试图找到降低双方关系风险的方法。如果说人们一致认为必须改变现状，那可能言过其实了。但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即这一看法肯定在许多国家都有众多追随者。目前尚不太清楚的是，如何在不产生其他问题的情况下解开现有的结构关系。

翻译：徐信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校对：顾嘉伟，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及“人工智能革命”正在进行，这些革命对驱动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到底意味着什么？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化的变化。21世纪的全球化将遭遇“创造性破坏”

①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46—147页。



的巨大挑战，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从概念、理论到实践，全球化本身就是创新的一个例证。全球化的韧性来自全球化的创新性。历史上，国家内政外交的巨变、战争、瘟疫、气候危机，都曾对全球化造成重大冲击，甚至导致了“全球化的中断”或“全球化的终结”。

近几年，世界上出现了不少关于“全球化的终结”（the end of globalization）的讨论。而仅仅在前些年（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人们对全球化还没有如此悲观，仅强调“全球化的危机”（the crisis of globalization）。从“全球化的危机”到“全球化的终结”的叙事转变，既表明全球化遭遇外在冲击，也反映出全球化发生了内在变迁——全球化作为一种结构（如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革命性、颠覆性、趋于长期性的改变。全球化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个不断遭遇“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新的“创造性破坏”将促使21世纪的“新全球化”取代历史上的各种“旧全球化”。

从“创造性破坏”视角理解全球化

庞中英，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文科讲席教授

以“创造性破坏”审视全球化的演化阶段

“创造性破坏”理论由熊彼特在20世纪30年代首次提出。所谓“创造性破坏”，是指创新逐渐破坏了既存的经济及其模式，但破坏后，新的经济会取代旧的经济，发展就此产生。熊彼特在他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提出：“国内国外新市场的开辟，从手工作坊和工场到像美国钢铁公司这种企业的组织发展，说明了产业突变的同样过程——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生物学术语的话——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①“创造性破坏”这一理论有助于理解全球化的发展阶段。

那么，到底该如何划分全球化的阶段？通过梳理现有的代表性文献，可以发现既有研究大多强调技术革命这个标准。理查德·鲍德温的贡献在于依据技术革命的演进来说明旧全球化（old globalization）和新全球化（new globalization）的分野。将全球化划分为七大时代的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同样强调技术的重要性。不过，萨克斯的全球化史是泛全球化史，尽管他非常重视技术因素，却没有使用“创新”的概念，也没有提到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

“创造性破坏”可以成为一个划分全球化阶段的有意义的标准，因为“创造性破坏”越出、溢出、跨过国家等区域而到达全球层面，全球范围的人类活动（如全球经济）才得以形成。人们通常谈及历史上的“四次革命”（科技和工业革命），不过，“四次革命”这一说法并不严谨，因为前三次已经完成，第四次则方兴未艾。

这里姑且也采用“四次革命”的提法。问题在于，这“四次革命”是否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当前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否可被定义为当代的“创造

性破坏”？

目前,包括世界经济论坛在内,人们习惯使用“全球化 4.0”概念描述“第四次工(产)业革命”。这与“第四次全球化”说法的实质是一样的,但同样有问题。严谨地讲,从“创造性破坏”的视角,全球化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目前正在进入第四个阶段,即全球化的第四阶段尚未完成。

理解全球化的“创造性破坏”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学界已经有大量基于不同视角理解和阐发全球化的论述,但目前仍缺少专门研究“创造性破坏”和全球化之间关系的文献。这也许是因为发达的经济学对全球化的研究是相对欠发达的。研究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经济学家,如阿吉翁等人,只是把全球化当作“创造性破坏”经济增长的一个方面。^①将“创造性破坏”理论引入全球化研究,有助于理解全球化的内生动力、全球化演化的根本原因、全球化演化的阶段、全球化的韧性和全球治理等问题。但本文并非旨在展示已经完成的全球化研究,而是提出“创造性破坏”理论如何适用于全球化研究。

我们不能忽视全球化概念本身的创新性。全球化概念史或者概念谱系史的研究表明,尽管 20 世纪 30 年代就有了“全球化”这一术语,但全球化概念的真正诞生却在 20 世纪 80 年代。1983 年,经济学家西奥多·莱维特在《市场的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一文中首创了全球化的概念。^②在这篇开创性文章中,莱维特建议(在美国的)企业要超越旧的“国际市场”(international markets),去发现新的“全球市场”(global markets)。“一种强大的力量驱动世界趋同,这个力量就是技术。”莱维特指出,新技术无处不在,它们改变了通信、交通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因此,全球市场出现了,也就形成了“市场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markets)。^③

全球化概念诞生前的社会科学和全球化概念诞生后的社会科学是不同的。全球化概念的诞生改变了许多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历

史学等。一个例子是,全球化概念诞生后,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纷纷指出,全球化古已有之,他们把全球化的起源追溯到远古。本来没有全球化概念的全球史学,则纷纷开展“全球化改造”,吸纳了全球化的概念。

不仅全球化的概念,全球化进程本身也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我们以往并没有从“创造性破坏”的角度理解全球化。美国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龙 2022 年出版了《延伸乌托邦:20 世纪经济史》(Slouching Towards Utopia: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④认为“创新”是 1870 年到 2010 年之间“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之一。该书明确指出全球化是 1870 年以来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重大创新之一。2023 年 11 月,在中国参加第十四届财新峰会时,德龙再次指出:“全球化是 1870 年之后,每十年就会出现的世界创新的最重要组成部分。”^⑤

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仅是英国本国的工业化,也标志着世界范围内新一轮全球化的开始。理查德·鲍德温尽管没有使用“创造性破坏”一词,但他从创新角度简要回顾了全球化历史。1820 年之后,由于蒸汽机、蒸汽船以及铁路等技术创新,交通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出现了生产和消费的“第一次松绑”,即“全球化的第一次加速”;1990 年后,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使全球范围的生产协调成为可能,生产和消费出现“第二次松绑”,带来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大合流”。在鲍德温看来,多次的“全球化加速”意味着全球化的多次创新。鲍德温后来又观察到数字技术给创新带来的“大动荡”,例如,他从就业的角度集中讨论了“机器人化”带来的挑战及其社会政治后果。^⑥

我们现在体会到的、看到的、研究的全球化其实是历史上一系列“创造性破坏”塑造而来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欧洲

① 菲利普·阿吉翁、赛利娜·安托南、西蒙·比内尔:《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余江、赵建航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 年。

② 参见庞中英:《世界进入全球化的第四阶段——纪念全球化概念诞生 40 周年》,《紫荆论坛》2023 年 7—8 月号。

③ Rawi Abdelal and Richard S. Tedlow, “Theodore Levitt’s ‘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 An Evaluation After Two Decade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Negotiation*, 2003.

④ J. Bradford DeLong, *Slouching Towards Utopia: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22.

⑤ 《钱颖一对话德龙:20 世纪经济史与未来》, <https://topics.caixin.com/2023-11-13/102135207.html>.

⑥ 理查德·鲍德温:《失序:机器人时代与全球大变革》,朱海燕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 年。



① Harold James,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② Harold James, *Seven Crashes: The Economic Crises That Shaped Global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3.

③ Klaus Schwab and Thierry Malleret, *The Great Narrative: For a Better Future*, Geneva: Forum Publishing, 2022.

学、历史学和国际事务教授哈罗德·詹姆斯在2001年出版过一本名为《全球化终结》(*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的书。不过,该书关注的主要是20世纪20至3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那次“大萧条”。^①詹姆斯在全球化鼎盛的21世纪初提出“全球化终结”,比目前的终结论早了至少20年。此外,这位学者深感于全球化概念被误解与滥用。因此,他又于2021年出版了《言辞战:全球化词典》(*The War of Words: A Glossary of Globalization*)一书。詹姆斯没有因为“全球化终结”而担心,而是出版了颇能增强人们信心的《七次大冲击:塑造全球化的经济危机》(*Seven Crashes: The Economic Crisis That Shaped Globalization*)一书。该书回顾了19世纪中期到现在的历次主要经济危机及其对全球化的破坏,提出了关于全球化的可持续性或韧性的论述。^②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引用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来强调全球化遭到的“大中断”和全球化的“浴火重生”。

人类创新活动引发的体系变革、模式变革和观念变革是更宏大历史视野下的“创造性破坏”。其中,技术创新最具代表性,它引发的全球产业革命和全球经贸体系的变迁,改变了全球化的发展轨迹,并重塑了劳动力、产业、资本乃至资源的全球分布格局,为全球化的互动提供了新的纽带。数字化和智能革命无疑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创造性破坏”,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受其影响。在传统的以人口和货物的全球流动为标志的全球化基础上,数字时代的全球化在信息和观念的全球流动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元宇宙”可以生成超越地理空间界限的互动场景,ChatGPT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能基于全球海量数据以及训练和深度学习输出定制化文本,人工智能

技术甚至可以实现视频的自动生成。文本、图像和视听产品正快速突破国界和文化圈层,不断填充全球化的虚拟空间。除了技术创新之外,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重大变化也是一种“创造性破坏”,不管是自发的经济金融发展模式创新还是被动的危机下的经济金融模式的颠覆式巨变,都深刻影响着全球化的发展道路,全球性危机诱发的结构性变化既包含危机引发的客观变革,也包含危机驱动下的思维创新和改革创新。

全球化“创造性破坏”后的韧性及其治理

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可以称之为“创造性破坏1.0”。与时俱进,现在已经进入了“创造性破坏4.0”时代。相比于“创造性破坏1.0”,“创造性破坏4.0”又有何创新呢?

当今各种“创造性破坏”使得韧性问题凸显出来。“韧性”一词开始流行,以至于韧性似乎成了“创造性破坏”的解决方案。根据施瓦布等人的研究,韧性指的是面对艰难境地时活下去的能力,或者是从困境中反弹的能力。^③

除了韧性问题,在各种“创造性破坏”后,“创造性破坏”的治理问题也被迫切地提了出来。人们经常把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混为一谈。比如,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为“全球化4.0:构建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新架构”,便是一个把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混为一谈的明显示例。在关于全球化的当代思想史上,这种混同已成为一个重要思维现象。

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也可以看作是人们试图把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结合起来讨论的例子。这次年会触及了对“创造性破坏”,即“全球化4.0”的治理(包括全球治理)的讨论。自1971年创立世界经济论坛以来,施瓦布的世界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声称,他的治理观是“以人和星球为中心”的“利害相关者的资本主义”。

施瓦布认为,“应对全球化4.0”至关重要。全球化是在科技、思想、人员、货物交流驱动下产生的现象。我们生活在一种新型的创新驱动型经济中,需要新的

全球规则、标准和政策来维护公众的信任。新经济已经破坏并重组了无数行业，通过增加价值创造知识的密度，新经济正在实现非物质化生产（dematerializing production），正在增强国内产品、资本、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竞争，也在加剧采取不同的贸易和投资策略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史无前例的科技进步意味着医疗、交通、通信、生产、分配和能源等系统将彻底改变。处理好这种变化不仅要求多国合作的新框架，还要求有新的教育模式，为工人提供新技能。^①

每一轮“创造性破坏”都是一个复合过程，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政治领域，对全球化的韧性是重大测试。在这个过程中，谁来协调新旧两种创新之间的关系？谁来建立与新的创新相适应的规范，从而使“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冲击不至于那么大？施瓦布等人认为，“创造性破坏”后，世界应该“重启”，应该由利害相关者来协调集体行动以实现治理。^②但是，对“创造性破坏”的治理是否将阻碍创新和经济增长？如何形成适度的“创造性破坏”治理？

除了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往往意味着对全球化进行治理。“创造性破坏”带来新的增长、繁荣，可以造福众人。但是，从旧行业、旧城市、旧全球化走出来的人，有的能够转移到新行业、新城市和新全球化，有的则不能，不能者则可能成为抵制“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并影响所在国家的政治进程。因此，全球化的韧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造性破坏”能否以平缓的方式展开，以较小的代价实现全球化的阶段递进和创新性进步。韧性建设需要考虑全球化受损者的立场，考虑遭受产业转型痛苦及冲击的国家群体的境遇，使韧性建设成为扩大受益群体、增大福祉的行动。如果国家和国际机构探索全球化韧性建设的制度化道路和法治化道路，跨国公司探寻增强全球化韧性的经济 and 产业变革的温和通途，那么韧性建设的经验可以不断累积，为未来面对新的“创造性破坏”提供制度和政策方案借鉴。

全球化的韧性建设是全球性话题，也是全球性使命，它要求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公众广泛参与其中。首先，要分析研判“创造性破坏”的性质、烈度、波及范围和正负效应，提前预判风险

和危机，推动规则和制度建设，形成应对“大震荡”的全球思想和舆论合力，为全球化韧性建设提供智慧和解决方案。其次，“创造性破坏”无论导致全球化的前进、倒退或大转向，人类社会都拥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权和自主性，并非在全球大变革下逆来顺受。因此，以科学界为核心的认知共同体应充分发挥创造性，在科学共识基础上为全球化韧性重塑提供认知支撑，比如关于智能化的世界将走向何方，科学家共同体有责任以全球发展和全球进步为己任，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方案或政策路径。各国政府应当为全球化韧性的重塑承担起国内责任和全球责任，在解决国内风险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全球协作。各方共同行动的目标是避免技术变革陷入无序和混乱状态，防止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变成智能机器的全球化。最后，“创造性破坏”在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会产生某些负面后果，需要全世界共同面对，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负面后果造成的危害，阻止新危机的爆发，为全球化谋划更优的道路选择，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是理解全球化，尤其是全球化演化本质的一个重要角度。19世纪末以来，“创造性破坏”在更大范围，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使全球化从旧阶段演化至新阶段。下一场“创造性破坏”，即下一次产业技术革命正悄然来临，未来的全球化与过去的以及现在的全球化注定不同。从“创造性破坏”及其治理的角度看待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① Klaus Schwab, “Grappling with Globalization 4.0,”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

^② Klaus Schwab and Thierry Malleret, *The Great Narrative: For a Better Future*, Geneva: Forum Publishing, 2022.

步入 21 世纪以来，我们见证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见证了全球大流行疾病的肆虐，也可能正在见证全球气温突破临界点所带来的环境危机。在如此严峻的全球化背景下，“韧性”概念备受关注。以拥抱变化为核心的韧性思维、韧性策略，成为人们构想未来世界的新方式。

步

① 参见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43—244页。



韧性思维

韧性 (resilience) 与强健性 (robustness) 都是应对扰动、保障安全的重要策略。这两者有明确的区分，但也不是截然对立。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老子关于牙齿与舌头的隐喻，^①是强健性与柔韧性的对比。舌头之所以有着比牙齿更长久的生命力，是因为受伤害的舌头比受损坏的牙齿更易于恢复。这种对比对于我们理解这两种策略之间的区别是重要的，但并不意味着韧性策略和强健性策略是不可调和、不可并存的两种冲突策略。

韧性常常被定义为，系统通过改变自身来适应外部的扰动，从而保持或复原其功能的能力。强健性则可以定义为，系统通过抵御外部扰动，从而保持其功能的能力。两者的区别在于，系统有没有恰当地通过改变自身以适应外部扰动。单纯采用强健性

韧性与全球复杂性

贾克防，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策略的系统，也可能会在外部扰动的作用下发生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往往是破坏性的改变。系统通过牺牲一部分冗余和缓冲，从而保持了整体功能的暂时完善。在一个网络系统中，这种破坏性改变体现为网络节点的丢失和网络连接的中断。相比而言，韧性系统应对外部扰动时，则主动改变和调整，以适应外部环境扰动。

按照强健性策略，系统维持其功能稳定的前提是自身结构和构成要素保持不变。而韧性策略并没有这一前提。按照韧性策略，在面对外部扰动时，系统的自身结构和构成要素都可能发生变动，以适应外部扰动带来的影响，同时又能维持自身功能的稳定，或者在经历扰动之后，迅速恢复原有功能，甚至形成新功能。因此，强健性策略带来的直观感受是，系统通过抵抗外在扰动的方式维持了自身功能的完整。与此相对照，韧性策略则是系统通过自身变化而与外在扰动达成了新的动态平衡；即使系统展现出的是原有的老功能，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新均衡。

尽管两种策略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在现实中，两种策略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韧性策略更像是强健性策略的迭代升级。首先，两种策略具有一些共同要素，大部分增加强健性的因素也是提升韧性的因素，诸如冗余和缓冲、多样性、可替代性等。系统中冗余要素的存在，能够使系统既具有强健性，又具有韧性。当遭遇外部扰动时，如果系统利用冗余保持了自身结构完整，从而使其功能稳定，那么系统就会展现出强健性；如果系统利用冗余，进行自身调整，从而适应扰动带来的变化，那么系统就会展现出韧性。其次，韧性策略的实施有赖于系统具备一定程度的强健性。在面对外部扰动时，系统调用韧性策略，调整自身以实现对扰动的适应，是一个过程，需要足够的时间。只有系统具有足够的强健性，才能为韧性策略的实施提供缓冲时间。因此，正是在强健性的基础上，韧性

策略才能够得以实施。可以说，提升强健性也是韧性策略的一个重要环节。更重要的是，韧性策略的核心依然是通过自身调整、拥抱变化，与环境中的其他系统建立更为恰当的连接。

相对于强健性而言，韧性是一种更优的思维方式，而对于“效率至上论”而言，韧性则是必不可少的应对策略。“效率至上”是泰勒式管理学的信条，也是现代社会的信条，但在美国未来学家里夫金看来，这一信条正在将现代文明拖入泥沼。效率之所以被推上神坛，根源在于人们对于功利主义的信奉。功利主义认为，效用最大化是幸福的关键所在，并且效用是可以量化的。功利主义幸福原则蕴含着对效率的追求：在一定时间内，得到的效用越多，越幸福。但必须注意，效用只在人们享用可产生效用的事物时才存在，因此，为了保障效用，积累可产生效用的事物就成为最佳选择。遵循这一逻辑，无节制地占有和聚拢各种资源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基于同样的理由，不仅要按照效率原则来占有资源，更要短时大量地将资源转化为对效用的“享受”，其结果便是消费主义的盛行。然而，人类社会并没有在“效率至上论”的指引下进入幸福天堂，反而处境日益堪忧。

效率主义过度简化地将效率作为衡量标准，而无法看到“高效行为”所带来的巨大的负外部性。“正是效率让我们登上了地球优势物种的制高点，但也是效率让我们把自然世界推向毁灭。”^①可以说，在效率主义的影响下，现代社会面临着从自然环境、经济生活、社会交往到地缘政治的多重危机。面对这些复杂的危机和风险，转变思维方式才是至关重要的。强调适应性、拥抱变化的韧性思维是人类社会应对生存危机、重返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

复杂性视角下的全球化

全球化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可以通过复杂性科学的视角加以理解。区域的或者全球的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城市系统等都是复杂适应系统，全球世界同样是一个具有复杂特征巨型适应系统。下

文在一个将全球世界理解为复杂适应系统的新图景下，详细刻画全球复杂性的诸种特征，从而将这一图景进一步完善。

复杂适应系统是一种以适应性主体为构成要素的有组织的复杂系统。^②有组织的复杂系统，是相对于无组织的复杂系统而言的。所谓无组织的复杂系统，它的全局性行为的涌现是符合大数定律的，因为它的全部构成要素之间丰富的随机异质性会使其各自变化相互抵消，从而使得系统范围的预测成为可能。有组织的复杂系统则不符合大数定律，因为构成系统的要素之间具有彼此依赖的交互作用，形成了以因果作用彼此连接的复杂网络。在这个复杂网络中，由于要素之间丰富的因果作用，从而产生循环因果关系，这就是反馈效应。反馈将会从根本上改变系统的动力学，从而涌现出新秩序和新事物。在复杂适应系统中，主体会根据环境变化和其他主体的行为调整自身策略，从而产生适应性，进而造就复杂性。

在复杂系统的视角下，全球系统是一个巨型网络，这个网络是一个由多种复杂系统连接而成的超网络。之所以被称为超网络，是因为它的每一个节点本身也是一个网络。全球化的具体领域，是全球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具体领域或子系统的划分，在于每个子系统都有着各自的涌现秩序。正是这些各不相同的涌现秩序，把全球系统区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子系统。这些不断演化着的子系统就构成了全球化过程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

在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全球化图景中，全球复杂性具有以下六个特征。

其一，分散的交互作用。在全球系统中，存在着大量主体，所有的主体都是并行、分散地采取行动。这些适应性主体的典型

① 杰里米·里夫金：《韧性时代：重新思考人类的发展与进化》，郑挺颖、阮南捷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第xi页。

② 约翰·米勒、斯科特·佩奇：《复杂适应系统：社会生活计算模型导论》，隆云滔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9—60页。

① 伊恩·戈尔丁、迈克·马里亚萨桑：《蝴蝶灾变：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张慧卉、曾一巴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第91页。

特点是能够对外部环境产生预期并根据预期调整自身行为。尤为关键的是，任何一个特定主体的行为选择都是依据其对于其他主体的预期。适应性主体根据已有经验，为既有规则不断重新分派信用，并基于归纳逻辑，不断发现新规则。

其二，没有全局性的控制者。复杂适应系统是一个分布式的复杂网络，而不是星型网络。在复杂适应系统中，不存在一个具有绝对掌控权的核心节点。任何主体的行动都是基于其对环境和其他主体的预期而进行的，通过预期模拟和对规则的掌握，高智能的适应性主体能够对掌控者产生适应性博弈，从而在不断演化过程中，使得掌控者的影响逐渐弱化。

其三，交叉分层组织。在复杂适应系统中，适应性主体不必然是人类或其他智能主体，而是满足适应性主体要求的任何主体。比如，处于有梯度的营养液中的大肠杆菌也是适应性主体，因为它们能够沿着营养液的梯度向特定方向做规律运动。同样地，具有特定执行能力的复合主体也是适应性主体。在复杂适应系统的网络中，任何一个节点本身也可以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因此，复杂适应系统展现出交叉分层组织的特征。在全球系统中，个人、社团、公司、城市、国家、区域合作组织等都是不同层面上的复杂适应性主体。

其四，连续适应。系统中的任何一个主体都会随着经验的累积而连续地调整其预期、行为和策略，从而不断适应环境变化和系统内部其他主体带来的变化。在当今时代，全球化持续改变着各个层级中行为主体的环境、认知和行为方式。

其五，永恒新异。复杂适应系统具有持续演化的特征。由于适应性主体之间的互动是难以停止的，系统整体永远处于变

化之中。处于变化之中、连续适应的系统，会不断地涌现出新的特征、新的秩序。而所谓的新事物，就是具身化的新秩序。

其六，非均衡的动力学。远离平衡态，是一切复杂系统的根本特征。这意味着系统的演化是没有终点的。远离平衡态是相对于趋近平衡态而言的，所谓趋近平衡态，就是运动变化的过程最终会达到一个均衡状态并保持在这个均衡状态。而远离平衡态，则意味着运动变化的过程不会达到任何均衡状态，而是会始终运动变化下去。同样地，全球化过程会持续地创造出新的可能性：新的生态位、新的技术形态、新的连接方式。

提升全球韧性的途径

全球系统是一个全球网络，全球韧性是一种网络韧性。全球化是一个永不停止、永恒新异的过程，因此，提升全球韧性的核心在于拥抱变化、增强适应性。笔者认为，提升全球韧性具有以下六种途径。

（一）适度地增加冗余

冗余既可以增加强健性，又可以增加韧性。供应链管理的精益管理策略已经受到广泛关注。这种管理策略的关键优势在于极度降低了冗余库存，从而能够提升效率，但是，它的缺点也十分明显。由于冗余库存被极度压缩，系统失去了自我调整的空间和余地，从而缺乏韧性，带来极大风险。例如，在2010年的油门踏板召回事件中，丰田公司的零库存策略导致替换零件不能及时交付，从而蒙受重大损失。^①再比如，在金融系统中，银行必须预留足够的准备金，以满足流动性要求。这些预留的准备金，就是为了应对提现风险的冗余资金。所以，适度地增加冗余，是提高韧性的一种方法。

（二）增加多样性

在供应链管理中，对产品进行模块化设计，采用具有地域多样性的供应链，可以分散由于同质性带来的风险，从而提高供应链韧性。2011年泰国遭遇严重洪灾，由于全球电子存储产能的四分之一位于泰国，从而导致硬盘供应大幅减少，引发了电子计算机行业

的全球动荡。^①这种由于缺乏韧性带来的损失，显然源于硬盘产业的地域同质性。消除同质性、增加多样性，以增强应对风险的能力，能够有效提升韧性。类似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同质性。金融机构持有的同质化的金融产品被彼此之间的复杂联系所掩盖，无法触发预警机制，从而引发了级联反应，导致危机发生。^②

(三) 改善网络拓扑结构

网络拓扑结构，可以分为星型网络、去中心型网络和分散型网络。分散型网络具有最佳的韧性，而星型网络的韧性最差。全球化的网络系统，是一种以关键城市 and 关键区域为关键节点的去中心型网络。在局部范围内，它依然是具有核心节点的星型网络。对这些星型网络进行优化，增强其韧性，依然是可能的。比如，按照美国3.0韧性基础设施计划，发展微电网来增强供电系统的韧性。^③这种策略相当于在原有电网的基础上增加大量的微型网络，从而使得电网的星型拓扑结构转变为去中心型的网络结构。

(四) 提升网络节点的自主性

加强适应性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是提升网络韧性的关键因素。当繁杂的规则超出适应性主体认知能力的时候，规则就会失效。比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金融产品的投资者必须阅读大量的产品说明资料，才能作出恰当的投资决定。而对于某些金融产品，比如担保债务凭证，投资者需要阅读的资料更多。^④过度复杂的规则和要素，使得金融风险被完全遮蔽。通过建立制度，可以降低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复杂性。也就是说，制度能够使行为主体面对的世界变得更加可预测，从而为行为主体提供可识别、能采取有效行动的机会。^④

(五) 增加网络连接强度

通过简洁规则连接的社会系统，比通过繁琐规则连接的社会系统具有更强的连接强度。信任，是一种简化社会复杂性的连接机制。卢曼认为，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中，人们不可能根据对行动后果的预测来指导所有的行动。^⑥通过信任，根据已有的证据进行归纳推断，人们就能够作出相对较好的决定。包括信任在内的全部规则，都是适应性主体在彼此的互动

中涌现出来的。这些规则，可以增加友好互动，让各个层级上的适应性主体，包括个人、社团、公司、国家和跨国组织，都能够不断反思总结，凝聚共识，从而提升连接强度。在面对全球性危机时，没有一个国家和政府能够独自面对挑战。增强合作互信，降低无效博弈，才有可能形成全球治理新方案。

(六) 科技赋能

当代科学技术对于提升韧性发挥着切实有效的作用。当然，科技手段并不都能提升韧性，而是只有通过赋能那些能够提升韧性的要素，才能真正地提升韧性。也就是说，在适度地增加冗余、增加多样性、改善网络拓扑结构、提升网络节点的自主性、增加网络连接强度等方面运用科学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能够提升系统整体的韧性。比如，在自然灾害的预警上，先进的预报系统可以更准确、更及时地发出警报，从而为系统进行调整、加以应对提供了足够的缓冲时间，进而增强了系统韧性。

总而言之，通过对韧性概念的哲学分析可以看出，韧性策略是强健性策略的迭代升级，进而通过复杂适应性系统的视角来理解全球化，给出了作为复杂适应性系统的全球世界的新图景。基于这样的新图景，我们认为，提升全球韧性，具有六种途径，即适度增加冗余、增加多样性、改善网络拓扑结构、提升网络节点的自主性、增加网络连接强度和科技赋能。

①② 伊恩·戈尔丁、迈克·马里亚萨桑：《蝴蝶突变：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张慧卉、曾一已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第84页，第63页。

③ 杰里米·里夫金：《韧性时代：重新思考人类的发展与进化》，第203页。

④ Haldane, A., "Rethinking the Financial Network," In Jansen, S.Schröter, E. Stehr, N.(eds), *Fragile Stabilitätstabile Fragilität. zu|schriften der Zeppelin Universität. Springer VS*, Wiesbaden, 2013, pp 243-278.

⑤ 布莱恩·阿瑟：《复杂经济学》，贾拥民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59页。

⑥ 尼可拉斯·卢曼：《信任》，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① Rifat Darina Kamal and Z. R. M. Abdullah Kaiser, "Trump and the Ascension of Western Realism: A Critical Discussion on the Western Realists' and Western Liberalists' Evaluation of Globalisation," *India Quarterly*, vol. 74, no. 3, 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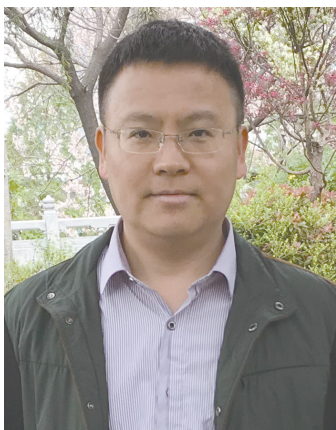
②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Chained to Globalization: Why It's Too Late to Decouple,"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1, 2020.

③ Charles A. Kupchan, "The Democratic Malaise: Globalization and the Threat to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1, 2012.

④ James Fulcher, "Globalisation, the Nation-State and Global Society,"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8, no. 4, 2000.

⑤ 乌尔里希·贝克:《“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王武龙译,载薛晓源、周战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81—385页。

在各种全球性危机的冲击下，全球化的发展前景饱受质疑，全球化韧性问题备受关注。全球化既未进入“枯竭期”，也未进入“停滞期”。数字全球化使全球化进入快速演进的轨道，拥有更广阔的拓展空间，并拥有韧性重塑的契机。数字全球化时代的韧性重塑攸关全球化的未来走向。



全球化走向终结了吗？

全球化终结论主要源于两种观念。一种观念是以偏狭的局部观审视全球事务，将全球化“原罪化”。有学者在批判特朗普时期的政策时指出，全球化浪潮改变了原本分立割据的世界格局，国家在无法实现自给自足的情况下，通过全球合作催生一体化意识，全球化为追求现代化发展的国家带来益处。特朗普政府将全球化视为威胁，事实上就是无视美国从全球化获益的事实，未能从整体性视野看待全球化。^①

另一种观念则悲观地认为全球化带来了国家间的对立和国际社会的分裂，认为全球化是“穷途末路”。有学者提出，全球化并不是各国的福音，反而造成了国家之间的纠缠，全球化网络变成了彼此设陷和博弈的竞技场，全球化带来的是脆弱、竞

数字全球化与全球化的韧性重塑

刘兴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争和控制，诱发风险和挑战。^②查尔斯·库普乾认为，基于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导致西方世界的治理危机，包括去工业化、贸易失衡、信贷泡沫等，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困局和焦虑。^③

全球化对助力民族国家的发展和成长至关重要，全球化并非民族国家的对立面。^④美国不仅不是全球化的受害者，相反，美国恰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依靠全球化实现了权力和地位的跃升。全球化在数百年的演化进程中，已经塑造了民族国家的全球化习惯、行为和认识，形成了“全球化基因”，并将持续影响全球互动关系。除非人类倒退至相互隔离孤立的蛮荒部落时代，否则全球性联系就会持续存在，全球化无法被人为斩断。

全球化并未终结，但的确正面临挑战而变得更加“漂浮不定”。乌尔里希·贝克的全球风险社会概念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全球风险社会是指与决策相关的全球性后果触发的一系列风险，这些风险与权威机构对全球灾难的叙事和承诺形成强烈反差，代表性风险包括生态危机、全球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具有全球化特征的威胁是政治意义上风险社会的表现形式。^⑤各种挑战和风险导致全球化进程出现波折，考验着全球化的韧性。在物理学的概念中，韧性与破坏、弯折和断裂相关。全球化韧性可以理解为全球化形成的体系在全球性危机和风险爆发前的消解力、爆发中的抗压力和爆发后的恢复力。

数字全球化场域与全球化韧性的 延展空间

全球化韧性塑造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全球要素仍有流动和聚合的新空间，而不是已经穷尽所有互联互通和碰撞融合的可能性。数字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次跃进。理查德·鲍德温提出，信息通信技术驱动的全球

知识和观念流动是新型全球化与旧式全球化的根本区别。^①数字全球化触发了多维场域生成情景，使全球化韧性拥有更加广阔纵深的延展空间。当然，这种延展空间只是表明全球化没有走入“死局”和“僵局”，拥有“继续全球化”的可能性，并不代表全球化一定会带来和平、善治的结果，也可能会导致冲突和竞争。

社会学中的“场域”概念是指各种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力量状况决定场域结构。场域是争夺的空间，位置占据者以场域为活动空间和制定策略的基础，这些策略用来改善其位置，即“特定资本的分配”，策略还取决于行动者基于位置产生的对场域的认知。数字全球化催生了新的权力场域、技术场域、资源场域、市场场域和道德场域。

第一，权力场域。全球权力结构因数字全球化而发生变革，世界政治中的权力经历从物质权力、制度权力、观念权力到数字权力的演变，全球权威性、声望和地位的内涵发生改变。数字世界的权力关系尚处于发展初期，全球数字社会的地位分配远未完成，全球化进程因数字权力关系的建构进入与传统全球化不同的时期。数字全球化诱发权力本身的重组和变迁，比如数字传播力和数字产业竞争力成为重要的权力要素，也导致权力主体的急剧增加，数字平台及附着于其上的各种倡议团体和网络用户都借助流量引导和舆论传播而拥有一定权力。

第二，技术场域。人工智能、元宇宙、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演进极大地推动了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全球化，建构了全球数字社会的新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数字技术场域的生成突破了全球化发展的“天花板”。人工智能尚处于开发利用的初期，远未达到真正类人工智能的阶段，其应用场景仍有广阔的想象空间。数字全球化使拥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国家受益，这些国家大力发展通信产业、芯片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获得了投资和增长的新动力，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转型，利用数字化能力开拓全球市场。

第三，资源场域。资源的竞争和合作呈现出与数字化发展日益关联的局面，数字科技发展所需的关键矿产和原材料成为国家技术角逐的新焦点，全球数字社会的资源基底被重新发现。数字霸权与反

霸权、数字等级制与反等级制触发新的全球社会互动，对资源的角逐和围绕资源的社会圈层既激发了“数字联盟”和“数字堡垒”的产生，也促成了局部世界在新合作领域的全球化。围绕资源的纷争尽管会侵蚀合作关系，加剧风险和脆弱性，但并未切断全球数字互联关系。

第四，市场场域。在传统全球化中，发达国家希望巩固其在资本—知识密集型产品和服务方面的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利用初级产品和轻工业获得比较优势，由此形成了全球化的局部僵局。全球数字市场的整合以及发展中国家广阔的数字化发展潜力拓展了全球经济活动的运作空间，数字化的市场场域已经生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并驾齐驱，成为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坚实力量。跨国数字公司所创造的数字平台和数字产品正在快速全球化，成为构建全球数字社会的基础单元。当然，数字互动和博弈的新议程也在不断涌现并引发争议，比如数字税和数据市场秩序等。

第五，道德场域。全球道义和全球舆论体系被数字全球化改写，战争、冲突和纷争成为在数字空间中被同步观察和讨论的公开事件，道义和舆论力量影响冲突的限度、烈度及其解决方式。数字全球化的社会属性日益突出，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联动性和一体性愈发明显。全球数字社会的浮现意味着全球公众对公共议程的全面介入。

国家、公司和个人在数字全球化新场域中的互动，超越了传统全球化范畴，开辟了全球化的新轨道和新通路，使全球化在更多维度上继续演进，全球化韧性有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全球化才不至于在有限的传统互动空间中被突发风险所压垮和摧毁。

① Richard Baldwin, *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6.

① Daniele Schilirò, "Towards Digit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vid-19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Research*, vol.2, no.11, 2020.

② 刘兴华:《数字全球化时代的技术中立:幻象与现实》,《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2期。

③ 薛晓源、刘兴华:《数字全球化、数字风险与全球数字治理》,《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3期。

④ 刘雪莲:《数字全球化的价值与局限》,《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数字全球化与全球化韧性的重塑契机

全球化终结的论调过度夸大了全球经济联系的局部裂痕,低估了全球化的持久生命力,全球化在全球互联密度有增无减的背景下拥有强劲的发展动力。数字全球化是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缔造了全球互联的数字社会,使失速的全球化进程再度加速,成为全球化韧性重塑的新契机。

首先,数字全球化以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为主要特征,数字经济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支柱,是确保全球化韧性的基础性力量。与实体经济相比,数字经济具有天然的全球性,交易快捷便利,受运输通道和运输环境的影响较小。在世界局部地区发生冲突和部分经济活动停滞的情况下,数字经济依然可以保持发展势头。在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冲击下,数字经济的勃兴使各国能够较快地走出经济低迷局面。

其次,以数据流动为核心的数字全球化正在以数据而非传统货物和服务为新的资源基底。全球数据流动正在呈指数级增长,数据流动加速并重新定义着全球化。数据是新型资源,在海量的全球数字活动中,数据不断产生并被利用,成为大型数据平台维系竞争力的基石。数据流动和数据开发虽然带来了一些新问题,但总体而言并没有冲击现有经济秩序和经济体系,而是促进了数据的生成和积累。数据供应的充足性和稳定性增强了全球化韧性。

再次,企业活动的全球化被充分激发,全球各种类型的企业通过数字化革新拥有抗击危机和风险的韧性,全球化正以数字技术为驱动力向前拓展。传统全球化中,大型跨国公司占据主导地位,在数字全球化驱动下,中小型企业可以借助既有的大型数字平台进入数字化的用户群、信息流和贸易网络。借助数字全球化,中小企业

可以快速成长为全球型企业,极大地扩大了经济活动领域和多元化市场,使其面对突发危机和风险时拥有更多替代选项。

最后,数字技术的全球普及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拉动了经济增长,创造了全球经济新增量,强化了国家发展韧性。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进步可能会产生失业问题,但也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激发新的市场需求并改善就业状况。人工智能技术还有可能实现智能驱动的跨越式发展。区块链技术能够加快交易速度,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金融包容性,正在不断扩大用途,被应用于数据存储、金融交易、供应链管理和环境治理等领域。以数据和信息流动为标志的数字全球化获得动能,政府、大型跨国公司、中小型企业和个人均广泛参与其中,全球数字平台确保了多元主体的全球性参与并赋予其全球影响力。^①数字技术开辟了全球化的新型快车道,提高了全球化参与者应对各种突发危机和政策性动荡的韧性。

数字全球化时代的新脆弱性和韧性

数字全球化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新脆弱性。脆弱性是指面对危机和风险的压力的承受力不足,有导致体系崩塌、损毁和衰退的可能性。全球化的脆弱性牵涉的是具有系统性效应和全局影响力的风险。脆弱性与韧性是全球化的一体两面,韧性无疑是减少脆弱性的重要禀赋和资本。

数字全球化时代的脆弱性日益引发关注和忧虑。数字霸权使“数字连接关系”受到等级压力的破坏,围绕数字科技的脱钩和遏制,以及基于意识形态的阵营对抗,威胁着全球数字发展和合作进程。^②数字分配结构的失衡是数字全球化进程中的关键风险,突出表现为数字鸿沟的存在,包括全球性鸿沟、地区内鸿沟和国家内部的鸿沟。^③数字鸿沟可能导致全球数字发展的断裂和停滞。由于人类对科技的深度依赖,数字技术的偏差可能加剧全球化的脆弱性。^④此外,数字全球化还催生了某些相互依存的脆弱性。数字全球化几乎无孔不入地将各个领域的参与主体连接起来,形成高密度的相互依存网络。国家对相互依存网络的

强大影响力越来越警惕，与产业数字化相关的资源成为争夺的新焦点，原本实体经济中的资源因数字全球化而变得高度稀缺和重要，这将增强全局的高敏感性和脆弱性。尽管这些脆弱性具有全局影响，但不能过度夸大其负面效应，尤其不能以一些脆弱性来抹杀全球化的所有正面效应。

韧性重塑对维系全球化在正常轨道上运行具有重要意义。追求韧性重塑这一目标本身就说明各国已经开始意识到不仅要关注全球性危机，也要正视全球化本身潜藏的危机。正如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在看到全球化带来的益处的同时也要看到其缺陷，全球化的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是我们管理全球化的方式。^①数字全球化时代，全球化韧性重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韧性。国家依然是全球化的首要主体，全球化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国家韧性，即国家有能力维系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在全球经济波动时有充足的政策工具和政策弹性，以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提高抵御危机和 risk 的能力。

第二，战略韧性。主要大国应妥善处理双边关系，避免将数字争议演变为大范围的数字冲突，提高战略沟通频率，增进战略互信，有吸收处理小争议、避免矛盾扩大、留有修复余地的战略宽松度，尤其应避免以意识形态划界，挑起全球数字对抗和冲突。

第三，规制韧性。面对全球标准，国家往往选择快速遵守，而不是开发国内新标准，尤其是对后发国家来说，无法独自在数字世界中开展行动。规制韧性需要特别关注那些没有能力进行制度规范开发的后发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针对人工智能风险等新的数字挑战制定制度

规范，然而全球步调并不一致，各国应当提高规制的包容性和互通性，避免出现“数字孤岛”和“数字堡垒”，更应避免规制冲突带来国家间冲突。

第四，关系韧性。数字全球化浪潮使供应链等关系网络更受瞩目，关系韧性建设意味着数字发展要关照各个节点上的国家，避免数字治理“美国化”、数字革新“美国化”和数字福祉“美国化”，即美国不是数字治理事务的唯一主导者，也不是数字革新的唯一推动者，更不应独享数字全球化带来的益处。全球数字关系应当具有覆盖度、透明性和交互性，小范围的数字关系不能变为“小院高墙”，而是应与其他关系相互融合，兼容并蓄。

第五，市场韧性。数字全球化需要稳定且具有弹性的市场。市场中的全球化关键参与者是数字公司，应维系全球数字产业关系的稳定性。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诸多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行动和政策，但美国数字公司与美国政府的立场大有不同，它们总体上欢迎数字全球化，期待数字全球化的前景和机遇，它们是数字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②市场韧性建设应避免将数字公司拉入国家间对抗的漩涡，对抗使之要么成为被打击的对象，要么成为经济胁迫的工具。同时，要维护好公司间跨国合作网络关系的可持续性，避免合作关系断裂导致的市场波动。

数字全球化时代，韧性重塑的目标不仅仅是维系全球化运转的稳定性，更是为全球数字社会的建构奠定基础。全球数字社会应当是一个包容东西方文化、拥有健全协同的全球性制度规范、具备抵御危机和 risk 能力的社会。韧性重塑需要各国意识到共同应对危机和 risk 的必要性，并切实采取行动破除阻碍全球化的“围栏”和“高墙”，在改进国内治理的同时提升全球治理的效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公司政治化的安全冲击及其对中国全球数字治理战略的影响研究”(21BGJ024) 阶段性成果。]

①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逆潮》，李杨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3年，第xx—xxi页。

② 刘兴华：《数字全球化进程中的美国数字公司》，载薛晓源、沈湘平主编：《全球化研究（2023）》，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3年，第203—204页。